



# 陶渊明与竹林七贤

◎ 王永波

**【摘要】** 本文的主旨在于阐明“竹林七贤”这一魏晋时期的名士群体对陶渊明立身行事、思想旨趣以及诗歌创作等方面的巨大影响，“竹林七贤”的领袖人物阮籍和嵇康对陶渊明的影响尤为显著。本文认为，陶渊明不但在立身行事和思想旨趣方面是“林下风气”的继承者，而且就诗歌创作而言，其四言诗多借鉴嵇康，五言诗也很明显受到阮籍《咏怀诗》影响，但其可贵之处就是在融汇的基础之上又有所突破和创新。

**【关键词】** 竹林七贤；林下风气；正始诗歌；陶渊明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0139(2010)04-0141-7

“竹林七贤”是魏晋之际声名卓著的名士群体，成为当时及后世士人敬仰的对象，东晋孙盛著《魏氏春秋》云：

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琊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三国志·魏书·王粲传》附《嵇康传》裴松之注）

南朝宋刘义庆在《世说新语·任诞第二十三》

中也有记载：

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琊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这一名士群体以崇尚老庄、蔑视礼法、嗜酒放达、才艺超群而著称，其中的代表人物无疑是阮籍和嵇康，他们两人不仅是当时一流的思想家，也是一流的文学家，可以称为正始文学的

〔作者简介〕王永波，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四川 成都 610071。

“双璧”。在魏晋易代之际，嵇康因其反抗司马氏集团的激烈态度而无辜被害，阮籍也在忧愤交集中死去，其他成员也或积极或无奈地采取了与司马氏集团相合作的态度，“竹林七贤”走向解体，并在其后一段时间里成为政治忌讳而少为人所提及。但随着时代的流逝，到了西晋后期他们又重新被朝野名士屡屡提及，成为时代风尚的标志性人物，很多年青一代的士人都深受其影响。《世说新语·德行第二十三》注引王隐《晋书》说：

魏末阮籍，嗜酒荒放，裸袒箕踞。其后贵游子弟阮瞻、王澄、谢鲲、胡毋辅之之徒，皆祖述于籍，谓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幘，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甚者名之为通，次者名之为达。

到了东晋时期，名士袁宏著《竹林七贤论》、戴逵著《竹林七贤传》专门对他们进行介绍和评价，还有不少的诗文专门歌咏和怀念他们，近年来在南京出土的六朝墓砖上居然有“竹林七贤”的画像，可见六朝士人对他们的推崇程度。可以说在东晋，“竹林七贤”已经成为士人崇仰的精神偶像，是魏晋风度的象征。《世说新语·贤媛第三十》记载：

谢遏绝重其姊，张玄常称其妹，欲以敌之。有济尼者，并游张、谢二家，人问其优劣，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风气；顾家妇清心玉映，自是闺房之秀。”

所谓“林下风气”，就是说才女谢道韞有“竹林七贤”的风度，这是至高的评价，出自一个尼姑之口，更可见“竹林七贤”对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

从陶渊明现存的诗文来看，他并没有明确提及“竹林七贤”<sup>①</sup>，但我们不能忽视“竹林七贤”对他的影响。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考虑：一，如前所说“竹林七贤”在当时社会巨大的影响力；二，陶渊明在世时不多的好友，曾为其撰写《陶征士诔》的晋宋时期的名士颜延之就是“竹林七贤”的崇拜者，曾写组诗《五君咏》来歌咏“竹林七贤”<sup>②</sup>，很

难想像两人在交谈的时候会不涉及这个话题；三、更重要的是如果从陶渊明的立身行事、思想旨趣、诗文创作等方面来考察，“竹林七贤”无疑对其有极为显著的影响。

### 一、陶渊明的“林下风气”

著名文学史家王瑶先生在《文人与酒》一文中有过这样精辟的议论，他说：“无论就所处的政治社会环境说，或就其思想状况说，渊明都和阮嗣宗有相似处；平淡虽然是比较平淡，但这只是程度上的差异。到陶渊明，我们才给阮籍找到了遥遥嗣响的人，同时在阮籍身上，我们也看到了陶渊明的影子。明潘璫刊阮陶合集，实在是眼光的。”<sup>[1]</sup>这段话可谓知言，但我们还要注意到其实在嵇康身上，我们也同样可以看到陶渊明的影子。景蜀慧在《魏晋诗人与政治》一书中就这样说道：“个人以为，在诸位前贤之中，陶渊明与嵇康在家世、素养、性格与为人方面最为接近，但对待政治现实的方式却不大相同。陶渊明和嵇康一样，都出身于当时较为寒素的家庭，但自幼有很好的文化修养和不凡的追求。在性格上，嵇康是以刚亢耿介、疾恶如仇著称，而陶渊明在表面的平淡静穆之下，也有着贞固刚直的个性。”<sup>[2]</sup>从后世关于陶渊明的传记和他的诗文中，我们可以说陶渊明是“林下风气”的继承者。

#### 1、个性和理想

“竹林七贤”诸人大多有着率真的个性，他们看不惯黑暗的现实，不愿与世俗合污追逐名利，这一点在嵇康、阮籍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阮籍有著名的“青白眼”，视礼法之士为“裤中之虱”。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这一旷世奇文中淋漓尽致地表白了自己对污浊官场的拒斥，体现了他“刚肠嫉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的刚烈个性。与嵇康一样，陶渊明也有性格刚直、不偶于俗的一面，如我们所熟知的他不为五斗米而折腰，不屈从于权贵的

① 旧题为陶渊明所著的《集圣贤群辅录》（下）记述了“竹林七贤”的事迹，但是现在不少人认为此书是伪托陶渊明所著，因此本文对此书存疑不论。

② 颜延之因王戎、山涛二人后来成为晋朝的重臣而将他们排除在“七贤”之外，所以只歌咏了其他五人。其实这也是当时许多士人的态度，他们所崇拜的“竹林七贤”是个隐逸的名士群体。

事迹,陶渊明在《与子俨等疏》中就说自己“性刚才拙,与物多忤”。他们所追求的是一种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方式,尽管这在现实中很难实现。

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谈到自己的人生理想时说道:“今但愿守陋巷,教养子孙,时与亲故叙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充满了对朴素亲情和平凡生活的向往之情,并没有像阮籍一样把理想寄托在虚无缥缈、远离人间的神仙境界。从这一点来说,陶渊明的人生理想更接近于嵇康而非阮籍。陶渊明在《杂诗十二首》其四中这样写道“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亲戚共一处,子孙还相保。觴弦肆朝日,樽中酒不燥。缓带尽欢娱,起晚眠常早。”又在《时运》一诗中说“斯晨斯夕,言息其庐。花药分列,林竹翳如。清琴横床,浊酒半壶。黄唐莫逮,慨独在余。”本文认为,嵇康和陶渊明人生理想的相似之处并非偶然,而是陶渊明对嵇康的有意继承。

而从生活历程的角度来考察,陶渊明又更接近于阮籍而非嵇康。《晋书·阮籍传》说:“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叹,于是赋《豪杰诗》。”由此可知,阮籍年轻的时候本来是胸怀大志的,在其《咏怀诗》中,阮籍多次流露出有济世的思想。如第15首中有“昔年十四五,志尚好书诗。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之语,第三十九首更吐露了“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的雄心和“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彰”的志节。无独有偶,年轻时的陶渊明也很有济世的雄心,其《饮酒》二十首之十六中说自己“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拟古》九首其八中说,“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

《杂诗》十二首其五中说,“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骖翮思远翥。”究其然,阮籍和陶渊明都是儒学世家出身,他们从小接受了良好的儒学教育,也接受了儒家匡济天下的理想抱负,不像嵇康自幼无拘无束,对名教向来就很反感。只是他们年轻时的抱负遭遇了无可施展的黑暗现实,理想

无可奈何地幻灭了。

## 2、寄酒为怀的旷达作风

提起“竹林七贤”,最令后人津津乐道的就是他们嗜酒的作风,在中国文化史上,他们是文人饮酒风气的开创者。“竹林七贤”无一不好酒,阮籍自幼便有“酒痴”之号,刘伶更是说“天生刘伶,以酒为名”,阮咸曾“与猪共饮”,即便山涛、王戎之辈,也有不少喝酒的事迹。在他们生活的时代,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危险,酣畅豪饮不仅成为他们麻醉自己,逃避政治迫害的工具,也是他们形神相亲和得意逍遥的凭借。

“竹林七贤”之后,魏晋名士嗜酒之风大为盛行,但除了部分士人用以全身避祸之外,更有如元康放达派盲目仿效,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竹林七贤”嗜酒的深意反而被淹没了。东晋名士戴逵作《放达为非道论》贬抑元康名士放达纵欲的作风,指出:

夫紫之乱朱,以其似朱也。故乡原似中和,所以乱德;放者似达,所以乱道。然竹林之为放,有疾而为辇者也,元康之为放,无德而折中者也,可无察乎! (《晋书·戴逵传》)

的确,正像东晋名士王忱所言“阮籍胸中块垒,故须酒浇之。”(《世说新语·任诞》第五十一)阮籍心中积郁难舒,故喝酒佯狂,王忱所言可谓一语道破。我们看阮籍每每醉酒后“穷途而哭”,刘伶醉酒后声称“何妨死便埋”,他们心中的苦闷可想而知。真正深得“竹林七贤”嗜酒深意并能发扬光大的无疑是陶渊明了。

在诗歌中大量以饮酒为主题的,陶渊明无疑是第一人,酒成为陶渊明生活和诗歌的标志,我们可以通过史传来了解陶渊明与酒的种种脍炙人口的事迹。萧统作《陶渊明传》说:

(颜延之)日造渊明饮焉。每往,必酣饮致醉。弘欲邀延之坐,弥日不得。延之临去,留二万钱与渊明;渊明悉遣送酒家,稍就取酒。尝九月九日出宅边菊丛中坐,久之,满手把菊,忽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归。渊明不解音律,而蓄无弦琴一张,每酒适,辄抚弄以寄其



意。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渊明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将尝候之，值其酿熟，取头上葛巾漉酒，漉毕，还复著之。

多么潇洒的饮酒风神，这是“林下风气”的真正继承者，并且在阮籍、刘伶那里，我们更多的是体味到他们饮酒时的痛苦和无奈。在陶渊明这里，当然也有全身避祸、借酒消愁、抒发怀抱的一面，但我们更多感受到他喝酒时的愉悦，他是真正懂得“酒中趣”的人。在陶渊明的诗文中，可以随处感受到陶渊明实际上是把饮酒当成生活中的乐趣。如“或有数斗酒，闲饮自欢然。”（《答庞参军》）“春林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和郭主簿》其一）“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已酉岁九月九日》）“一觴虽独尽，杯尽壶自倾。”（《饮酒》其七）“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饮酒》其十四），陶然自得的心境实在令人神往，可以说陶渊明把“竹林七贤”饮酒之风发扬光大了，赋予了更多更深的内涵，这是如元康名士等人所无法企及的。

### 3、崇尚自然的思想旨趣

自然和名教的关系问题是魏晋名士思考的中心问题，“竹林七贤”是以崇尚自然，蔑视礼法而著称的，他们追求精神的自由和个体人格的独立，这在嵇康和阮籍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嵇康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越名教而任自然”（《释私论》），可以视为“竹林名士”的思想宣言。他们所追求的“自然”指人的自然本性和天地的自然本质，由此他们痛恨人世间的一切虚伪和巧饰。“自然”一词基本不见于先秦儒家典籍，是老子、庄子哲学的特有概念，是顺应万事万物本性的自然而然，老子尤其是庄子认为，强力人为的结果必然造成对万物自然本性的戕害，是背离大道的行为。“竹林名士”是魏晋时期第一批接受庄子思想的名士，他们通过自己的诗文来宣扬庄子的自然说，其中向秀还作了对后世影响很大的《庄子注》，史称“向秀于旧注外为解义，妙析奇致，大畅玄风”（《世说新语·文学第十七》），给庄子思想在魏晋的广泛传播造成不可估量的影响。

陶渊明不是一个哲学家或思想家，而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但不可否认他有深刻的哲思，这也是他卓然于普通诗人之上的重要原因。在他的诗文中，最经常被引用的典籍是《论语》、《庄子》和《老子》，有人统计，陶渊明诗文中引用《论语》68处，引用《庄子》有55处，引用《老子》有24处<sup>[3]</sup>，可知陶渊明的思想实是儒道兼宗的，但他思想中最有特色之处就是对自然的崇尚。近代著名史家陈寅恪先生曾有《陶渊明之思想与清淡之关系》一文专门讨论陶渊明的思想，将之称为“新自然说”，而与嵇康、阮籍等“竹林名士”的“旧自然说”相区别，然而仍然可以看出其中的联系。文中说：

渊明之思想为承袭魏、晋清淡演变之结果及依据其家世信仰道教之自然说而创改之新自然说。惟其为主自然说者，故非名教说，并以自然与名教不相同。但其非名教之意仅限于不与当时政治势力合作，而不似阮籍、刘伶辈之佯狂任诞。盖主新自然说者不须如主旧自然说者之积极抵触名教也。<sup>[4]</sup>

陶渊明的“新自然说”即是对嵇康、阮籍等的“旧自然说”的继承，但又有新的特色，就是他的委运任化的思想。正因为有了这种思想，他才超越“竹林七贤”把自然和名教完全对立的激烈态度，而平静坦然地接受自然和命运的安排。“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形神影·神释》），最突出地表达了这种思想。罗宗强先生认为，“从玄学的基本品格而言，则它在人生态度、人生目的上还是有一个最基本的要求的，那便是以一种委运任化的人生态度，达到物我一体，心与道冥的人生境界。”他认为，从玄学兴起到东晋的名士们都没达到这种境界，“把这样一种人生态度付之实践，并且常常达到物我一体、与道冥一的人生境界的，是陶渊明。”<sup>[5]</sup>不过罗先生认为陶渊明能达至这种境界是借助于儒学与佛学的力量而非玄学的理论力量，笔者对此稍有异议。笔者认为，委运任化的人生境界更多的是借助于《庄子》的委运顺化、坦然接受的人生态度，仍然是“竹林七贤”思想旨趣的发展，只不过比起阮籍和嵇康，

陶渊明的幸运之处是没有卷入政治的漩涡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田园。

## 二、陶渊明的诗歌渊源

南朝钟嵘在其《诗品》中把陶渊明诗列为中品,认为:

宋征士陶潜,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文体省静,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直。至如“欢言酌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耶?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sup>[6]</sup>

钟嵘称陶渊明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这个看法基本得到了后世的认可,但他对陶诗源流的论断却在后世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宋人叶梦得在《石林诗话》中最早对此说提出了批评,他说:

然论陶渊明乃以为出於应璩,此语不知其所据。应璩诗不多见,惟《文选》载其《百一诗》一篇,所谓“下流不可处,君子慎厥初”者,与陶诗了不相类。五臣注引《文章录》云:“曹爽用事,多违法度,璩作此诗,以刺在位,意若百分有补於一者。”渊明正以脱略世故、超然物外为意,顾区区在位者何足累其心哉!且此老何尝有意欲以诗自名,而追取一人而模仿之?此乃当时文士与世进取竞进而争长者所为,何期此老之浅,盖嵘之陋也!<sup>[7]</sup>

自叶梦得之后,对钟嵘此说提出批评的还有不少,有人还另外提出陶诗的源流,如清人沈德潜在《古诗源》中评陶渊明说:

晋人诗,旷达者征引《老》、《庄》,繁缛者征引班、扬,而陶公专用《论语》。汉人以下,宋人以前,可推圣门弟子者,渊明也。渊明以名臣之后,际易代之际,欲言难言,时时寄托,不独《咏荆轲》一章也。六朝第一流人物。其诗有独立千古者耶?钟嵘谓其源出於应璩,成何议论!<sup>[8]</sup>

沈德潜认为陶诗源流于《论语》,是想把陶渊明归于儒家诗教传统。陶渊明在诗文中确实多处引用《论语》,但说他“专用《论语》”,实在比较牵

强。

朱自清先生在《陶诗的深度》一文中就注意到:

“陶诗意境及字句脱胎於《古诗十九首》的共十五处,字句脱胎於嵇康诗赋的八处,脱胎於阮籍《咏怀》诗的共九处。”<sup>[9]</sup>袁行霈先生在讨论陶诗渊源时也认为,陶潜诗歌“与其说源出应璩,不如说源出汉、魏、晋诸贤,应璩是决不足以笼罩他的。如果一定要在这众多的源头中特别提出两三个来,则不妨说其源出於《古诗》,又绍阮籍之遗音而协左思之风力”<sup>[10]</sup>。本文循此线索考察,认为在五言诗方面阮籍对陶渊明的很多作品有重要影响,而在四言诗方面嵇康对陶诗的影响也极为明显。

### 1、嵇康与陶渊明的四言诗

四言诗本来是先秦时期《诗经》的重要诗歌形式,但秦汉时期主要应用这种诗歌形式进行创作的人很少,直到魏晋时期才出现了四言诗的短暂复兴,其中最重要的四言诗人就是曹操、嵇康和陶渊明。曹操的四言诗继承《诗经》,形成了自然质朴、慷慨悲凉、刚健爽朗的诗歌特色,来表达自己的渴望建功立业的雄心,就总体诗歌风格上来说明显与陶渊明的四言诗不相类。

嵇康以文章著称,诗歌的成就稍稍逊色了一些,但其四言诗也很有自己的特色,为后人所赞赏。嵇康的四言诗如《悲愤诗》,确实有如钟嵘所说有“过为峻切,讦直露才,伤渊雅之致”的一面,激愤悲怆,横议是非,缺少含蓄之致。但嵇康的四言诗更有清逸脱俗、逍遥自得的一面,这在他的《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组诗和《酒会诗》组诗里面体现得极为明显。葛晓音教授在《八代诗史》中评价说,嵇康的《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里的“这些诗无论就句法的活泼新颖还是境界的清隽玄远而言,都成为陶渊明四言诗的先声”<sup>[11]</sup>。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嵇康和陶渊明的四言诗,先看一下嵇康的四言诗:

轻车迅迈,息彼长林,春木载荣,布叶垂阴。习习谷风,吹我素琴。皎皎黄鸟,顾俦弄音。感悟驰情,思我所钦。(嵇康:《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十九首之十三)

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磻平皋，垂纶长川。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钓叟，得鱼忘筌。郢人逝矣，谁与尽言。（嵇康：《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十九首之十五）

淡淡流水，沧胥而逝。泛泛柏舟，载浮载滞。微啸清风，鼓楫容裔。放棹投竿，优游卒岁。（嵇康：《酒会诗》其一）

再来读一下陶渊明的四言诗：

靄靄停云，蒙蒙时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静寄东轩。春醪独抚。良朋悠邈。搔首延伫。……翩翩飞鸟。息我庭柯。敛翮闲止。好声缸和。岂无他人。念子实多。愿言不获。抱恨如何。（陶渊明：《停云》）

洋洋平泽，乃漱乃濯。邈邈遐景，载欣载瞩。人亦有言，称心易足。挥兹一觴，陶然自乐。……斯晨斯夕，言息其庐。花药分列，林竹翳如。清琴横床，浊酒半壶。黄唐莫逮，慨独在余。（陶渊明：《时运》）

衡门之下，有琴有书，载弹载咏，爰得我娱。岂无他好，乐是幽居。朝为灌园，夕偃蓬庐。（陶渊明：《答庞参军》六章其一）

我们比较一下嵇康、陶渊明的这几首四言诗，无论从诗歌的意境、风格还是其中的意象来看，其实都是极为相似的，充满了怡然自得、了无挂碍的闲适情趣和潇洒飘逸、神情悠远的林下风气。其中体现的物我一体的玄趣，是嵇康、陶渊明两人将个人生活情趣审美化所带来的自然流露，他们已经将生活诗化了，但相比较而言，只是陶渊明的诗歌境界更为冲淡自然。

## 2、阮籍的《咏怀》和陶渊明的《饮酒》诗

关于阮籍和陶渊明诗歌承袭的关系，也有人曾经注意过。明人胡应麟在《诗薮》中曾经指出：“元亮得步兵之澹，而以趣为宗，故时与灵运合也，而与汉离也。”<sup>[12]</sup>清人方东树在《照昧詹言》中屡屡阮、陶并称，如他说道：

阮公贤乎哉！六朝人学识旨趣，陶公外未有及此者矣。

又说：

如阮公、陶公曷尝有意於为诗，内性既充，率其胸臆而发为德音耳。钟嵘乃谓陶公出於应璩，又处之以第七品，何其陋哉！宜乎叶石林之闢之也。<sup>[13]</sup>

由此可知方东树不但极为不满钟嵘陶诗源于应璩说，而且从学识旨趣以及为诗态度等方面，将陶渊明视为阮籍的继承人。

陶渊明五言诗大体可以分为田园、咏怀、行役、赠答和咏史五类。如果就诗歌渊源而论，其咏史诗比较明显地受到左思的影响，如钟嵘所言“协左思风力”，其他如《古诗十九首》以及魏晋诗人曹植、陆机等也对陶渊明五言诗的创作有很大影响，田园诗更主要是自己的独创。

在陶渊明的五言诗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田园诗，但就其现存诗歌而言，咏怀诗的数量在其中所占比重最大。汉魏以来抒发个人情怀的诗作日益增多，陶渊明咏怀一类的诗作未必尽受阮籍的影响，但我们同时也要看到，真正第一个全以自舒胸怀为主题进行诗歌创作的还是阮籍，他的81首《咏怀》组诗是中古诗坛的奇葩，对后世有着巨大的影响。阮籍身处魏晋之际，面临司马氏集团屠戮异己的血风腥雨，内心忧愤万端而又悲苦无奈，只能借诗歌来抒发自己的苦闷和忧惧，所以其《咏怀》诗充满了忧生之嗟和迁逝之叹。因其深深卷入黑暗险恶的政治之中，虽有伤时刺世的想法，但又充满了欲言难言的痛苦。阮籍《咏怀》诗的一大特点就是隐晦，《文心雕龙》说是“阮旨遥深”，唐人李善说：“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蔽，百代之下，难以情测。”（《文选·咏怀诗》注）

陶渊明也像阮籍和嵇康一样，生活在易代之际。东晋末年，先是桓玄篡位，接下来是刘裕崛起，东晋王朝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作为一名高洁正直的士人，陶渊明也像阮籍和嵇康一样对污浊的现实深深不满，但陶渊明不像阮籍和嵇康那样激烈。尽管数次出仕，但因为远离政治漩涡的中心，而少有像阮籍那样避无可避的痛苦和无奈。陶渊明找到了归隐的田园，安顿了自己的身心，但他的内心并非



总是像他的田园诗里所描述的那样闲适自然,他并没有完全忘情政治,他也有痛苦和挣扎,也有苦闷和无奈,这在他的很多诗里都有反映,尤其是他的《饮酒》组诗。其实陶渊明是在《饮酒》诗题下“咏怀”的,关于这一点,萧统在《陶渊明集序》里就说,“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焉。”传世最早陶诗注本的注者宋人汤汉就主要给《饮酒》组诗作注,他在序中这样说:

陶公诗精深高妙,测之愈远,不可漫观也。不事异代之节,与子房五世相韩之义同。既不为主击震动之举,又时无汉祖者可托以行其志。故每寄情于首阳、易水之间,又以荆轲继二疏、三良而发咏,所谓‘抚己有深怀,履运增慨然’,读之亦可以深悲其志也已。平生危言孙行,至《述酒》之作,始直吐忠愤,然犹乱以度词。千载之下,读者不省为何语。是此翁所深致意者,迄不得白于后世,尤可以使人增欷而累叹也。余偶窥见其指,因加笺释,以表暴其心事,及他篇有可发明者,亦并著之。<sup>[14]</sup>

实际上也就是说陶渊明诗也有“遥深”的一面,需要经过注解才能发明微旨,这和阮籍的《咏怀》诗是非常相似的,我们可以具体比较一下。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

见,忧思独伤心(阮籍:《咏怀》其一)

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厉响思清远,去来何依依。因值孤生松,敛翮遥来归。劲风无荣木,此荫独不衰。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陶渊明:《饮酒》其四)

这两首诗可以说从语言风格和感情内涵上都极为相似,甚至在诗歌意象上也很接近,同样是以徘徊于外野的“孤鸟”作为处在苦闷中的诗人的象征。但阮籍的人生理想是幻灭的,是没有依托的,因此只能“独伤心”,而陶渊明的“失群鸟”经过四处徘徊,终于找到了“孤松”一棵作为依托之所,这是陶渊明既继承阮籍又别于阮籍的地方。不仅是所举两首,如果仔细体味《咏怀》和《饮酒》这两组诗,是不难发现两者的相通之处,也就更能理解为何王瑶先生会说,“到陶渊明,我们才给阮籍找到了遥遥嗣响的人,同时在阮籍身上,我们也看到了陶渊明的影子。”

综上所述,可以说陶渊明与“竹林七贤”之间,无论从立身行事、思想旨趣还是诗歌创作等许多方面来看,都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其中“竹林七贤”的代表人物嵇康和阮籍对陶渊明的影响尤为显著,陶渊明是“林下风气”的继承者,同时在诗歌创作上也对嵇康阮籍多有借鉴,并且能推陈出新、别开生面。

#### 【参考文献】

- [1] 王瑶. 中国文学史论集[C].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43.
- [2] 景蜀慧. 魏晋诗人与政治[M]. 中华书局, 2007. 203.
- [3] 李剑锋. 陶渊明及其诗文渊源研究[M].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5. 87, 134.
- [4] 陈寅恪. 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A]. 陶渊明资料汇编[C]. 中华书局, 1962. 358.
- [5] 罗宗强. 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M].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1. 342.
- [6] 钟嵘. 诗品译注[M]. 中华书局, 1998. 65.
- [7] [8] [9] [12] [13] [14] 陶渊明资料汇编[M]. 中华书局, 1962. 52, 200, 291, 163, 224, 109.
- [10] 袁行霈. 钟嵘《诗品》陶诗源出应璩说辨析[A]. 陶渊明研究[C].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157-158.
- [11] 葛晓音. 八代诗史[M].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9. 100-101.

(责任编辑 苏 宁)